airiti

人口學刊
第 55 期，2017 年 12 月，頁 39-97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55, December 2017, pp. 39-97

研究論文
DOI: 10.6191/JPS.2017.55.02

北京城市新移民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去」與「留」之間

宋郁玲* 陳金永**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yuling@cc.ncue.edu.tw
** 美國華盛頓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E-mail: kwchan@uw.edu

收稿日期：2017.10.03；接受刊登：2017.12.26

airiti

摘要

本文在探討中國城市新移民是否能透過空間流動而影響社會流動，進而成為未來的中產階層，達到中國「擴大中產階層」的社會發展目標。在戶籍制度仍具有深刻影響力的中國社會當中，城市新移民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本文提出的問題是：影響中國城市新移民社會流動的因子是什麼？空間流動能否克服制度障礙成為積累資本形成社會流動的途徑？我們將城市新移民的特性分析並加以分類，透過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57位受訪者，以疊圖與主題分析城市新移民中各個群體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係。我們依據城市新移民的階層狀態分為：「邊緣專業」、「邊緣白領」、「邊緣知識」與「邊緣富裕」等四類。整體而言，在戶籍制度產生集體排除的狀態下，對戶籍制度有較多負面感受者，他們更傾向於透過空間流動來尋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可能，如「邊緣專業」與「邊緣富裕」，文化資本則無法成為城市新移民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反之，對戶籍制度逐漸漠視或者順從制度的壓力者，繼續透過移動累積資本的可能性較小，如「邊緣白領」、「邊緣知識」。他們雖然是中國「擴大中產階層」的對象，但生活空間卻在都市發展政策下被一步步逼退，考驗著「去」或「留」的抉擇。

關鍵詞：空間流動、社會流動、邊緣中產階層、城市新移民、北京

airiti

壹、前言

在科技與通訊技術革新的今日，「流動」（mobility）幾乎成為涵蓋全球化下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態，即使以戶籍制度刻意抑制人口城鄉流動的中國也不例外。中國在2011年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50%（人民網 2012），這被諾貝爾經濟獎得主Stiglitz喻為21世紀影響世界最重要的兩件事之一（Chan 2012）。大量的流動人口從農村移入城市，成為支撐城市勞動力與消費市場的重要生力軍。根據估計，目前中國約有2億人口從農村移動到城市之中，並且大多是沒有城市戶口的外來農民工（Chan 2013）。但以目前中國高舉「擴大中產階層，邁向和諧社會」的社會改革目標來看，「中產階層」才是能將強大的消費力轉向國內消費市場提升經濟產值的群體，讓城市經濟逐漸由依賴農民工的低價勞動力轉向中產階層的消費力，這是目前接收巨大農村人口的城市所希望朝向的目標。

在這改革方向上，許多學者提出相關策略，陳金永（2013）提出一套完善的戶籍改革路線圖，他認為改革的步驟應從「年輕的大學（含大專）畢業生第一優先，然後是熟練技工及穩定的自我就業勞動者，最後是低技術農民工（包含『普工』等）。」循序漸進，逐漸使人們擁有居住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最終達到讓戶籍制度成為歷史的目標。這足以顯現這一群從農村或其他城市（鎮）進入城市讀大學或工作，擁有大學（或以上學歷），或具有相當經濟資本的城市新移民，他們在新一波中國城市發展與戶籍制度改革中扮演了先鋒的角色，屬於中國當前社會改革目標下「擴大中產階層」以提升中國內部消費市場的主要群體。

現有的中國城市移民研究中進行了幾種移民的分類。他們的地位與處境介於城市居民（natives）、永久移民（elite）與暫時性移

airiti

民（outsiders）之間（Fan 2002），也無法依照當地戶籍有無分類的「都市勞工」（urban workers）與「暫時性的移民勞工」（temporary migrant workers）之中辨識出來（So 2003; Taubman 2000）；亦不屬於未擁有城市戶籍的定居農村移民（established rural migrants）或是甫進入城市的農村移民（recent rural migrants）的分類（Logan et al. 2009)。雄厚的文化資本與中等以上的職業，使他們不似農民工明顯地處於城市的弱勢地位，也不似已經拿到戶口的城市移民或原本的城市戶口居民得以在城市安身立命。而在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係上，不似較低社會階層的農民工與城市精英都可能存在錯置的關係現象。在中國社會階層分化逐漸複雜化的今日，他們的階層不明確性使得容易在學術與社會政策討論當中被忽略，但是這群城市新移民卻是中國戶籍改革關鍵年代中最重要的群體之一。

但是，目前有較多相關文獻關注於農村人口流動到城市之後，因戶籍制度的限制等其他連帶因素並沒有造成社會流動，呈現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錯置的狀態，牽涉到許多有待解決的制度與社會福利相關議題，其中多數相關研究聚焦在農民工群體，主題散佈在戶籍制度改革（陳金永 2013; Chan 2010, 2011, 2013），包括他們個人遷移歷程與調適經驗（杜鵬等 2008；賀雪峰等 2010；賀雪峰、黃磊明 2009；羅遐 2011)，人口組成與階層流動（邊燕杰等 2008; Fan 2002），移民社區與城中村（Wu et al. 2013; Zhang 2008）等。 現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對瞭解中國當前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做了許多貢獻。

隨著流動人口出現教育水準提升與年輕化的趨勢，近年來開始出現針對城市新移民階層流動的討論（朱迪 2013；李春玲 2011；李培林、張翼 2008；李強、王昊 2014；廉思 2013；劉于琪等 2014)，內容集中於探討他們的階層定位、分類適宜性、社會網絡、心理狀態、消費能力、居住條件以及在城市中的定居意願等群體特徵，一方面強調他們的功能，在當前中國人口組成變化，人口紅利消失的狀況下，對於大城市勞動力供給與消費力提升是重要的群體；另一方面則強調

airiti

他們處在「中產」與「底層」社會階層之間尷尬的處境，尤其因戶口而造成一連串機會不平等，是相關文獻中共同關注的焦點。這些討論皆顯示階層流動後的各種狀態，但是較少將「流動」所涉及的空間與社會特性放在一起討論，也就是在探討社會流動過程中，空間流動如何成為成為一種助力或者阻力，以改變階層位置。本研究將呈現在中國特有的社會結構—戶籍制度下，社會流動與空間流動兩者如何在城市新移民的群體中相互關聯。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企圖補充現有研究的缺乏，理解影響中國城市新移民社會流動的因子是什麼？空間流動能否克服制度障礙成為積累資本形成社會流動的途徑？

本研究主要以2015年對57位北京城市新移民進行深度訪談分析，以回應上述的研究問題。以北京為研究區域，源於過去研究者進行過數年上海與北京的研究，相較於上海，北京的戶籍制度較為嚴格，城市性格上雖然較為包容，吸引許多來此受高等教育者定居，但往往申請戶口困難重重而顯現出戶籍制度所創造出的制度性問題。且北京城市之內因國家中央單位與城市政府並存，在制度上常呈現雙軌並行的現象，較容易觀察制度如何影響群體行動策略。因此適於本研究探討城市新移民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中國流動人口的社會階層狀態，相較於1990年代已經有明顯改變，逐漸成為中產階層的潛在群體。但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下，社會流動的可能性變得更加複雜。以下我們將對流動人口的社會階層狀況、戶籍制度的影響，以及社會流動與空間流動關係的理論觀點進行文獻回顧。

一、「擴大中產階層」與戶籍制度

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成長後，一批正在崛起且具備消費能力的中

airiti

國「中產階層」（middle class），在2008年之後受到全球經濟青睞，使中國開始企圖脫離「世界工廠」的全球經濟角色。而在中國內部，「中產階層」也成為中國政府希望能逐步擴充的社會階層，除了將有助於創造政府近年來提倡的「和諧社會」以外，也將強大的消費力轉向國內消費市場提升經濟產值。因此「在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轉為「在中國販售」（sold in China）的主張逐漸浮現。

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相當多樣與模糊，類似的概念還包括中產階級、中間階層及中等收入階層等，一般認為分歧不大，普遍以職業上處於中間層的社會群體視為中產階層（李強 2017）。有學者認為中產階層適用於階級分析的研究中，較強調從馬克思（Karl Max）主張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所牽涉到的經濟不平等面向，另一方面則是較強調社會結構的「僵固」，較少顧及上下垂直流動的可能（王信賢等 2011）。但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對學術著作的審核中，主張以「階層」代替「階級」，以去除「階級」所隱含的社會衝突意涵。一般認為，中產階層只是一個模糊的相對概念，階層之間的界線並不清楚。其劃分的標準不只是收入水準和財富擁有，同時包括社會關係與生活機會等因素。前者，意味著物質擁有決定一個人所能得到的；後面這兩者是：為了得到你所能得到的，所擁有的決定了你不得不去做什麼，因此是限制與調節收入獲取和分配過程的權力關係函數（Breen 2005）。相較於只偏重以所得做為分層標準的「中等收入階層」更具有分析性，儘管中國想打造的是一個「中等收入群體」，強調財富與消費能力提升，是社會穩定與進步的方向，但實際的社會發展過程卻比這個目標更加複雜。據此，本文統一以「中產階層」稱之。

儘管在中國社會，是否存在著真實的「中產階層」 至目前為止仍在論辯階段，依照中國社科院對中國的中間階層進行分析，將現在的中國社會劃分為十個階層並與五大社會經濟等級相互對照，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已經出現中間階層，2008年中間階層估計占總人口數的22-23%，但人數仍明顯少於中下階層（陸學藝 2010）。但在國際上

airiti

普遍存在對中國中產階層快速成長的樂觀看法，預測中國中產階層總人口比重將在10年之內從12%成長到增長到50%，總增加人口數為5.2億人（Chan 2012）。近來，李強（2017）提出中國的中產階層占樣本的19.12%，[1]但有73%左右屬於中產邊緣層，[2]因此對現階段的中國而言，如何使這個群體過渡到中產階層，則是達到「擴大中產階層」的重要任務。

社會階層概念透露的理論意涵是：一個人在社會上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及權力，將影響他所處的結構位置，因此當行動者所擁有的各種資本發生改變，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也會隨之改變，於是社會流動便會產生。在目前的中國社會中，社會流動與空間流動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根據第五次與第六次中國人口普查數據可以發現，省際流動人口中，「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生產、運輸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等非白領職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職員、商業服務人員」等「白領」職業的比例明顯提高，從2000年的28.9%上升到2010年的41.0%，他們成為潛在的中產階層人口。此外，在中國城市社會階層的調查中發現，中產階層的比例從2008年的18%提升到2011年的27%（朱迪 2013）。另有數據顯示，在超過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中，中產階層的比例達到41.1%，中產邊緣群體占了總樣本的25.35%（李強 2017），而像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能吸引更多非農戶口進入城市從事專業技術與管理，以及商業服務業等工作。其中位於職業上層的人口組成中，本市人口在所有職業階層中占了16.52%，而省內跨市流動以及跨省流動人口都約為7%左右（李

1　使用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1%的抽樣樣本，選取16-64歲的有職業人口，也可稱為有經濟活動能力人口，總樣本數為683,291人（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6）。

2　根據「國際社會經濟職業地位指數」（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 ISEI），即將所有職業都轉換為一種地位指數，然後量化確定每個人社會地位的方法。該研究將ISEI得分67分及以上者定義為社會上層，41-66分為中產階層，16-40分為社會下層。研究中關注38-40分以及41-45分的群體。前者屬於社會下層的上層，而後者屬於中產邊緣，就是雖劃入中產階層，但卻處於邊緣狀態。

airiti

強、王昊 2014），這顯示流動人口在職業向上流動上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他們來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有許多是年輕且有一定技術的農民工與受過高等教育，但是收入與工作一時不太理想的大學畢業生，他們尚未達到中產階層，被稱之為邊緣中產階層，將會是擴大中產階層的來源（朱迪 2013；李春玲 2011；李強 2017；李培林、張翼 2008）。

以北京為例，根據2010年中國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的常住外來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流動人口數近十年來有大幅度的增長。北京從1997-2010年共增加了將近500萬人，約增長3倍左右，而年齡組成幾乎沒有變動，15-59歲的勞動力人口占了所有年齡組的90%。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2年的調查顯示，在全國流動人口中，15-45歲的年輕勞動力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流，占總流動人口數的71.6%。另外，外來人口的教育程度上有比較明顯的變化趨勢。大專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逐年增長，從2001年的9.7%到2015年的28.9%（李曉壯 2017），是最明顯的增長趨勢（見圖1）。這表示流動人口當中，擁有高學歷者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根據統計資料推算，目前全中國流動人口中，大專學歷以下的農民工約占60%，1980年以後出生，大專以上學歷的流動人口估計有1,500萬人（廉思 2013）。他們即便擁有相當的文化資本或平均以上的經濟條件，尚無法在城市安家落戶。他們若為中國擴大中產階層的標的群體，那麼能否在社會階層上向上流動則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中國原本對流動人口的社會階層流動持樂觀的態度。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01年的報告中指出，流動人口要成為大企業主、高收入的專業技術人員與辦事人員較為困難，但較可能從業於經理人員、個體工商戶與工人，而在經濟收入方面超過同階層的非流動人口。而流動與非流動人口之間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的差異並不像人們通常所估計得那麼大，他們的社經地位略好於非流動人口的低層人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1）。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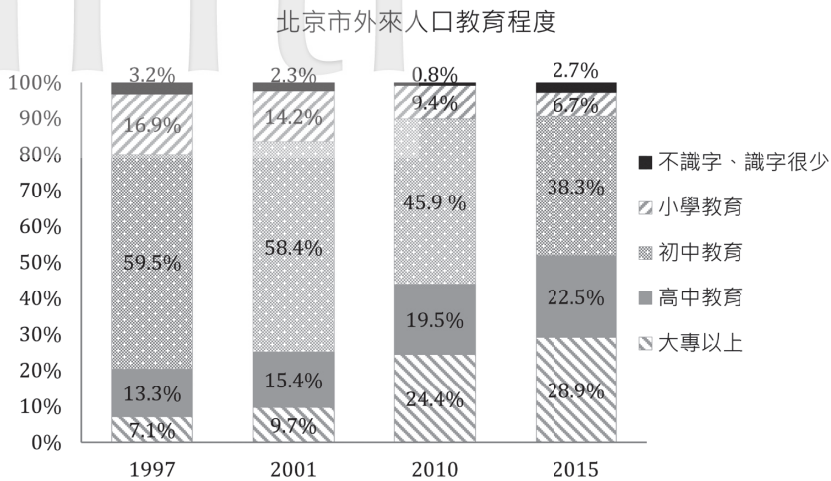

圖1　1997、2001、2010、2015年北京6歲以上外來人口教育程度變化之比較

但是，社會階層流動阻礙正在增加當中。在超大城市的職業分類結構中發現，單位負責人、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屬於白領階層的群體在比例上明顯低於有戶口的本地居民，流動人口中的比例占17%左右，本地人口中則超過43.89%。但是在中小城市中，省內跨市流入人口在白領階層的比例都明顯高於本地人口，這意味著在超大城市中，戶口是阻礙進入優勢職業階層的一項機制。而且這種狀況隨著中國「十二五」規畫，以及《國家新型城鎮化規畫（2014-2020）》強調「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重點放開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使戶口的阻礙作用更加明顯（李強 2017；李強、王昊 2014）。如此，流動人口要在大城市中達到社會流動，擴大中產階層的人口數量則將受到阻礙。

回顧中國戶籍制度從1958年起正式確立，用以嚴格控制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與居住，也將中國帶入城鄉二元社會，不僅控制農村人口必須留在農村並從事農業活動，城鄉之間的社會資源與機會也有巨大的差異，反映了城鄉社會的權利與發展的不平等，而人口流動

airiti

也呈現停滯的狀態，戶籍制度成為造成社會最大不平等的機制（陸學藝 2010）。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農村人口為尋求工作機會向都市流動而成為1980年代的非法流動人口—「盲流」，1990年代之後中國調整了城市化發展的方向，也逐漸改變了對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經商的態度與政策，於是驅動了1996年以後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現象。但是從農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移動仍然相當困難，到目前為止，一般農民多半只能暫時居住於城市成為沒有城市戶口的流動人口（Chan 2010）。儘管如此，中國流動人口的數量仍逐年大幅增加，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居住地與戶口登記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約為2.2億，相較於2000年的統計，共增加了約1億人，增加幅度為82.89%（中國國家統計局 2016）。2012年末中共十八大會議中將施行55年之久，徹底分離城鄉關係的戶籍制度首次在黨代表大會上提出改革，主張「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新華網 2012），此舉與擴大中產階層密切相關，因為唯有使城市移民擁有城市戶口，有權利在城市生活，中產階層的壯大以及後續的公平穩定社會才能成為可能（Chan 2013），如同報告所述：「讓農民工真正轉移成市民，不僅關乎中國城鎮化和現代化的未來，也是實現公平正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新華網 2012）。不過，根據相關研究顯示，流動人口他們在城市工作與居住，為城市建設帶來便宜的勞動力，卻無法獲得城市人可享有的社會福利與保障，這些戶籍制度造成城鄉移民處於城市弱勢的不公平現象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也累積了相當可觀的研究（Chan 2010; Fan 2002, 2008; Li 2013; Wang et al. 2009; Wu 2004; Wu 2006）。但是隨著流動人口在知識水準提升與專業技術能力增長的情況下，流動人口已經改變過去由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組成，出現更多樣的類型。廉思（2013）的《青年藍皮書：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關注那些有別於傳統農民工的流動人口，以城市新移民稱之，並將他們區分為三類：「蟻族」、「新生代農民

airiti

工」與「城市白領」（人民論壇網 2013；廉思 2013）。另外還有以教育程度以及職業形態分為「智力型新移民」、「勞力型新移民」與「投資型新移民」（劉于琪等 2014）。他們共同之處是從農村到城市裡生活與工作，受困於無法取得城市戶籍而徘徊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年輕移入者，除了「新生代農民工」以外，他們是一群擁有豐厚文化資本，他們與農民工一樣留在城市之中希望向上流動成為真正的中產階層，但生活狀況與經濟收入相對落後，居住在條件惡劣的狹窄空間中，雖有定居城市的意願但卻不易實現，因此也被稱為「雙漂族」或「邊緣中產階層」（李春玲 2011；張耀蘭、李方軍 2013）。相較於農民工，他們因為擁有中產階層特徵中的文化資本，於是離中產階層的距離更近一些。簡言之，他們是擁有一定經濟、文化或權力資源，但相較於中產階層較為弱勢的群體（陸學藝 2010；廉思 2013）。儘管如此，他們無法在大城市之中安身立命，真正透過空間流動而實現社會流動。以上觀之，從中國的社會發展目標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若形成正向的關係（也就是從其他地方移入大城市尋找各種機會後，導致經濟、文化、社會等資本的提升，而改變占據社會結構位置，造成向上的社會流動），將能逐步地化解中國社會日益明顯的社會不公平與階級衝突（So 2003, 2013; Whyte 2010a, 2010b）。

二、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係

工業化之後的自由理論認為最大的社會流動是達到公平最有效的機制，同時社會流動是社會正義的催化劑（Kaufmann et al. 2004）。空間流動（spatial mobility）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後，往往俱有社會向上流動的正向意涵。人口從機會較少的農村到都市當中尋找工作機會，爾後落腳城市之中提升生活條件並使他們的後代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尤其在全球化脈絡下空間流動的頻率大幅增加，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彼此構成正向連結的邏輯，在當前全球化時代中經常被論者提及

airiti

（Cass et al. 2005; Sheller and Urry 2006）。但有些論者認為，這種觀點並未察覺空間流動之中社會階層分化的現象，因為不同社會脈絡下對空間流動的控制與資源分配，以及不同社會階層被分配到不同的資源與社會網絡，都造成了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之間關係的變化甚至是錯置（mismatch）（Axhausen 2002; Cass et al. 2005; Faist 2013; Urry 2010）。

因此許多研究關注於流動當中隱含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主要在揭露跨界移動當中再生產的不公平機制，並以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的關係加以檢視。Beck （2008）認為跨界互動與移動的機會成為決定階層不公平的最重要因素，因為空間流動是個人資本積累促使階層向上流動的重要過程，因此，位於較高社會階層者也具有更好的移動能力，就如同Bauman（2003）描繪的全球化世界的階級圖像：「上層階級」的人能突破空間限制雲遊四海，「下層階級」的人則受限於空間難以移動。此外，英美都市貧窮的研究中，也強調缺乏移動與社會排除之間具有密切關係（Jaffe et al. 2012）。這些觀點主要在批判空間流動背後的社會結構影響著社會流動的結果。

屬於較低社會階層者，在傾斜的社會結構制度下，儘管在空間上流動，但在社會階層的流動卻產生停滯的現象。於是相關研究在都市貧窮的群體中發現空間移動不盡然是社會移動，更可能是想像的移動，因為個人能力與社會結構的限制，使得都市貧窮者在想像上的流動遠大於他們真的能夠進行的身體移動，或者他們跨越國界的能力以及建立跨越國界的關係，甚至比在城市中縫合社會與空間的縫隙要更容易（Jaffe et al. 2012; Smart and Smart 2003）。以都市年輕流浪漢（young homeless people）來說，空間移動是一種生存的策略，但是都市貧窮的處境往往也讓他們被迫滯留在流動之中（fixed in mobility）（Jackson 2012）。相較於都市貧窮者，精英與中產階層的空間移動則與社會流動息息相關，但是許多精英階層寰宇主義者他們在空間中快速移動但是卻無關社會流動，而是受全球化脈絡下的經濟

airiti

結構所驅動。這顯示人在空間移動並非意味著能在過程中累積資本，同時產生社會向上流動；反而，空間流動往往將不公平合理化，特別在不同的社會階級當中產生不同的影響（Faist 2013; Jackson 2012; Jaffe et al. 2012; Smart and Smart 2003; Sheller and Urry 2006）。

上述的文獻脈絡指出在英美社會當中，空間與社會流動的錯置多發生在貧窮與寰宇菁英之中，除此之外多數人能夠透過空間流動達到社會流動的目標。但是在當前中國城市移民分層多樣化與戶籍制度的影響下，中國城市新移民的生活狀態是什麼？空間流動能否克服制度障礙成為積累資本的途徑？本研究旨在回答上述問題，並將目前已經進行的57位城市新移民深度訪談初步結果加以呈現，做為後續分析的基礎。

參、研究對象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城市新移民群體，他們主要為「80後」（1980年代以後出生），為了讀大學（或研究所）以及工作的人口，他們並沒有取得當地的戶口，但可以享受城市基本的公共服務，保障待遇，例如在北京能買房買車，有社會保險等。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擴大中產階層」的可能性，因此以尚未成為中產階層的「邊緣中產」群體進行分析。

過去相關的研究中，曾對這一群體做過各種分類，其中包括：一、「新生代白領」與「蟻族」，[3]前者主要為非體力勞動者，後者

3　概念來自《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廉思 2013）、《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2：流動時代下的安居》（廉思 2014）兩冊報告。這是由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年發展研究中心從2007年以來開始進行各類城市新移民的調查所集結而成的報告，包含了五次大規模的實地調查，針對不同群體共發放有效問卷約16,500份，範圍擴及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重慶、南京等地。報告內容將城市新移民區分為三種群體：「蟻族」、「新生代農民工」與「新生代白領」，對其生活狀態進行分析，強調城市新移民在城市生活中面臨的問題，提供充沛勞動與消費力的積極角色與功能。

airiti

是大學畢業、低收入、聚居的群體（廉思 2013）。此外，類似的類別還有「邊緣化新白領」，是大學畢業未滿三年的群體，收入達到2.5倍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的標準，其中也涵蓋了「蟻族」、「北漂」這類地方認同與生活處境類似的群體（吳啟焰、劉春卉 2015）。二、「邊緣知識群體」、「邊緣白領」、「邊緣富裕」。這一分類的標準主要為職業階層、收入以及教育程度（朱迪 2013）。三、「經營銷售群體邊緣層」、「技術人員隊伍的邊緣層」、「普通辦事員、行政人員的邊緣層」以及「服務人員邊緣層」（李強 2017）。這是以職業進行分類，其中「經營銷售群體邊緣層」占總群體的68.3%，「技術人員隊伍的邊緣層」占4-5%，即所謂的農民工，但具有相當技術能力的工人，「普通辦事員、行政人員的邊緣層」中，包括政府機關的合同制辦事員以及輔助人員，還有勞動合同制僱工，「服務人員邊緣層」包括生活輔助人員、醫療輔助人員、社區輔助人員等。這四類人被認為處於中層與下層的過渡帶，也是擴大中產階層的人口主力來源。

綜整前述分類的優缺點與適宜性，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以「邊緣知識群體」、「邊緣白領」、「邊緣富裕」以及「邊緣專業」四個群體為主（見表1）。因為在前面三種分類當中，第一類與第三類是以單一標準來分類，前者強調文化資本的差異，以大學畢業為基準，後者則以職業區分；第二類的分類標準包括職業階層、教育與收入條件，相對於前述兩個分類較能區分出受訪者的差異性，但是仔細檢視其各類的內涵，發現並不一定符合城市新移民的群體屬性，例如：有部分的「邊緣富裕」，在內容上是屬於有北京戶口、年老、無業但富裕者。此外，在本研究田野調查中發現，城市新移民還有一種類別，他們屬於專業人才，如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產業工程師、科研人員、企業管理階層。目前占北京專業人才的29.44%，[4]他

4　根據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北京市的專業人才為199,325人，其中戶口登記在外省市的人口為58,689人（中國統計出版社 2010）。

airiti

表1　本研究受訪者分類

分類	邊緣專業	邊緣白領	邊緣知識	邊緣富裕
教育程度	大學、大專或以上	大學、大專或以下	大學、大專或以上	初中、高中或以上
（可支配）收入[a]	高於平均	平均收入或以下	高於、等於或低於平均	高於平均
職業階層	專業技術，服務業人才，如IT工程師、律師、以及企業管理階層。	普通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工作人員（推銷員、餐館服務員、電腦維修）。	大學畢業三年之內，尚在轉換工作的技術人員，或待業中的人口。	個體戶，高級技術工人。

資料來源：參考朱迪（2013）後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a]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國民可支配收入（National Disposable Income, NDI）是衡量一個國家最終所得收入的總量指標，以中國為例，是國民生產總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減去所有稅收、企業儲蓄（五險、公積金）和折舊，加上支出其他轉移支付與政府利息等後，實際可以支配的收入。2016年北京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57,275元。

們尚未獲得北京戶籍，並且也還不確定未來是否留在這裡繼續生活，相較於已經擁有北京戶籍的中產階級，呈現較多的生活壓力與挑戰，本研究將他們歸類為「邊緣專業」。

本文第一作者在2015-2016年，利用暑假期間在北京進行深度訪談。受訪對象共57位，是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城市新移民（參見附錄），大多於1990年代末期前因為讀大學或研究所而到北京，或在家鄉鄰近的城市讀完專科、大學後，到北京來找工作。依照參考前人研究以及田野調查的經驗，本研究受訪者當中有29位「邊緣白領」、9位「邊緣知識」、8位「邊緣富裕」以及11位「邊緣專業」。

整理受訪者基本資料概況初步顯示（見表2），每個群體的性別百分比，只有「邊緣知識」男性比重較高。「邊緣白領」與「邊緣知識」的年齡集中在21-30歲，「邊緣富裕」集中在35歲左右，四個群體中平均年齡以「邊緣知識」最年輕，「邊緣富裕」最年長。在教育程度方面，除了「邊緣富裕」群體的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程度外，「邊緣專業」的碩士學歷者最多，「邊緣白領」主要為大學學

airiti

表2　本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單位：%）

社經條件與經歷	群體			
	邊緣專業	邊緣白領	邊緣知識	邊緣富裕
性別				
男	54.5	51.7	78.8	62.5
女	45.5	48.3	22.2	37.5
年齡				
21-30	54.5	86.2	100	0
31-40	45.5	13.5	0	100
學歷				
碩士	63.6	0	22.2	0
大學	27.3	65.5	77.8	0
專科	9.1	27.6	0	0
高中	0	6.9	0	12.5
初中（及以下）	0	0	0	87.5
戶口				
城市	50	10.3	11.1	0
城鎮	50	37.9	44.4	25
農村	0	51.8	44.5	75
來京目的				
讀書與工作	64	21	87	0
工作	36	79	13	100
平均來京時間（年）	10.1	7.1	6.3	17.8
婚姻				
已婚	63.6	27.6	11	87.5
未婚	36.4	72.4	89	12.5
年平均收入（萬人民幣）				
個人	21.3	7.4	13	10
家戶	31.74	17.25	15.66	10.97
居住狀況[a]				
自有	45	0	0	0
租屋	55	83	100	100
與父母同住	0	3	0	0
宿舍	0	14	0	0

註：[a]「邊緣富裕」群體中，來自農村的受訪者在家鄉擁有宅基地，或者已經自建住宅。

airiti

歷，其次為專科與高中學歷，「邊緣知識」主要為大學學歷，其次為碩士學歷。平均學歷由高而低為「邊緣專業」、「邊緣知識」、「邊緣白領」、「邊緣富裕」。「邊緣專業」中，大多是在北京就讀大學或研究所後留下來工作，因此他們在北京的時間當中，有一部分是就學階段，「邊緣知識」群體也多是在北京讀大學者，所以扣除就學年分，在北京的工作經驗都在三年之內。而「邊緣白領」有較高比例是純粹來北京工作，「邊緣富裕」來北京主要就是為了工作，沒有任何受訪者曾在北京就學。受訪者居住於北京的時間，整體以「邊緣富裕」者居住的時間最長，其次依序為「邊緣專業」群體、「邊緣白領」群體，以及「邊緣知識」群體。關於婚姻狀態，「邊緣專業」與「邊緣富裕」的已婚比例高，而「邊緣白領」與「邊緣知識」僅有少部分受訪者已婚。個人年平均收入以「邊緣專業」最高，「邊緣白領」最低；家戶年收入依然以「邊緣專業」最高，「邊緣富裕」最低。在居住狀況中，四個群體僅有「邊緣專業」在北京擁有自有住宅，且比例頗高為45%，而「邊緣知識」與「邊緣富裕」全數在北京租房。「邊緣白領」的居住狀況較為多元，但仍以租房為主。至於未來是否有長期定居北京的意願，居住最久的「邊緣富裕」者皆選擇離開，其餘的類別受訪者當中，選擇留下或離開的幾近各半，表示對他們而言，北京並不是一個永久生活之地。此外，對於目前自己的社會階層描述，不論哪個群體大多認為是中下階層，顯然，受訪者對於自己的社會地位並不滿意。上述基本資料，彰顯各個群體的社會屬性，將在文後研究分析進行整合討論。

關於受訪者的來源地，在「邊緣專業」群體中，城市與城鎮戶口各半，但無人屬於農村戶口，區位分佈於東北、華北、華東及華南沿海省分；「邊緣白領」群體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屬農村戶口，包含的省分範圍廣闊，大致上集中來自華北及華中地區，當中又以鄰近河北省居冠，這與「邊緣白領」來北京的動機主要為就業，較少是就學後留下來工作，因此從鄰近省分地區移入的就業人口比例較高；「邊緣

airiti

知識」群體中城市戶口者占11.1%，其餘城鎮與農村戶口平分秋色，來自省分分佈均勻較無聚集性；「邊緣富裕」群體中多數來自農村，占總體的75%，來自城鎮的人占25%，來自省分集中於華中地區。

我們透過滾雪球的方法獲得受訪者，由於第一作者為臺灣來的學者，又是透過熟識的介紹人從中認識，且他們與研究者年齡較近，也都在類似的生命週期之中面臨工作競爭以及購買住宅的階段，因此在面對面訪談過程中配合意願較高，談及共同經歷的主題時受訪者也會好奇臺灣的狀況如何，而構成互為主體的訪談過程。訪談類型屬半結構深度訪談，研究者先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閱讀所獲得的訊息擬定問題大綱，主要涵蓋他們移居到北京的經歷，包括遷移的動機、目的、遷移的過程、工作、租房購房的選擇過程、自我身分定位與對城市的空間感受等，以理解他們做為城市新移民的生存狀態。訪談過程在經過受訪者同意下全程錄音，並做手寫記錄以做為參照。

本研究分析策略是以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選出共同的主要主題。主題分析法經過國內學者近年來引介後，已經逐漸成為較成熟的分析方法，也在國內外不同研究領域範疇的質化研究中用做分析方法（李姿瑩 2016；林秀娥、趙祥和 2015；Lanham et al. 2012; Sitas et al. 2014)。透過產生初步譯碼、尋找主題、檢視主題、定義主題與命名等主題顯現的步驟，從看似瑣碎雜亂的訪談文本中抽絲剝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呈現的方式來解釋文本當中蘊含的深層意義（高淑清 2008）。本研究在抽取出意義單元，並逐步歸納為更大集合的次要主題，與最大集合的主要主題之外，並將四個群體的意義單元出現次數依據高低等級區分，並從相同級數當中抽出四個群體當中都會出現的意義單元，也抽出四個群體中不會重疊的意義單元，並將這些義意單元再整合成為主題，呈現在表3當中，以分析四個群體在北京生活經驗與自我身分定位的異同性。

下文的研究發現中，首先將根據訪談的社經背景與遷移過程描述，呈現四類邊緣中產群體的空間流動特徵。再者，透過主題分析的

airiti

內容呈現四類邊緣中產群體的遷移過程、居住經驗以及身分認同與社會階層。最後，依據前面兩者分析，將四類群體的空間流動與社會流動之間的關係，並回答本研究的提問：理解影響中國城市新移民社會流動的因子是什麼？空間流動能否克服制度障礙成為積累資本形成社會流動的途徑？

肆、研究發現

一、空間流動

本研究受訪者目前在北京的空間位置（見圖2）與居住流動的頻率（見圖3-6）。本研究區為北京市，圖中環線所包圍的核心區是北京的舊城區，分為西城區與東城區，以此向外環狀擴張到「六環」，這是北京市區擴張的範圍。環線是客觀的地理位置，以傳統區位理論的觀點來看，越向外部環線擴張，房屋價格越是便宜。除此之外，北京市民素來有傳統的區位印象，像是「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以及「上風上水上北京」，前者強調北京城市中心為核心的東西邊優於南北邊；而後者則顯示相較於南邊，一般居民的居住選擇會傾向於北邊。因此，環線與傳統區位概念都左右了北京的房價，也形成了社會空間分化現象（socio-spatial differenciation）。

根據受訪者基本資料上目前居住的位置，顯示「邊緣專業」較集中於接近市中心區的二環與三環一帶，為經濟能力較好的群體；「邊緣白領」集中在西北邊的三環到四環之間，以及北邊的郊區，及南邊的三環與四環一帶，凸顯受訪者中，IT產業從業者多，他們多半以租房的方式在鄰近工作場所地區居住，到北京生活的時間比「邊緣專業」較短，教育程度較低，經濟條件還不夠雄厚；「邊緣知識」看似住在西北，或者東邊四環左右地區，甚至有在二環以內，但他們的特性多半甫自大學或研究所畢業，正在找工作或者工作三年之內還在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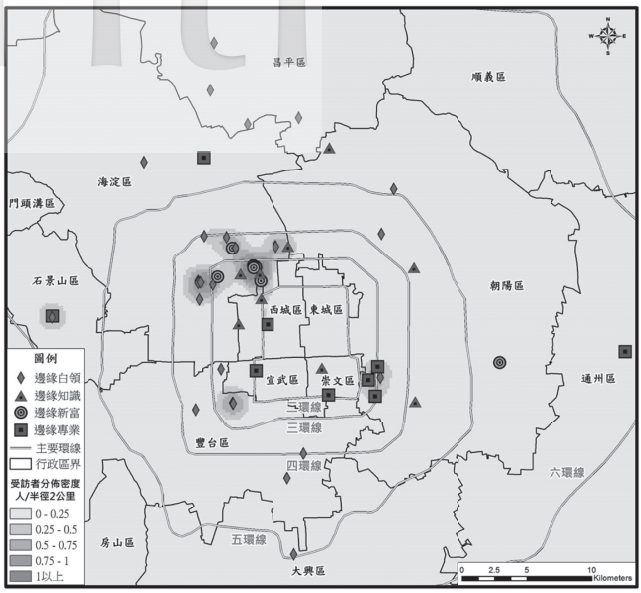

圖2　本研究受訪者現居地位置

作間不停轉換的狀態，因此居住地常依賴就讀大學的地緣關係；「邊緣富裕」的居住位置主要與研究選取的店家有關，他們學歷較低，來到北京的時間為四組中最長，本研究所選擇的個體戶店家是在大學附近，這些店家都靠著承租店面經營小生意為生，並且在附近租房，其中多位在老家已經有房。

除了目前居住的位置之外，但是他們的空間流動，如搬遷次數與搬遷的地點區位順序等，也凸顯了群體之間的差異。居住期間搬遷的次數（見圖4-7）以「邊緣富裕」者平均搬遷次數2.8次居冠，「邊緣專業」者平均1.9次、「邊緣知識」者平均1.5次、「邊緣白領」者平均1.4次。搬遷次數雖然與居住長短相關，[5]但也與他們的遷移過程、居住經驗以及身分認同與社會階層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其中最明顯的

5　「邊緣富裕」者居住的時間最長，平均有17.8年，其次依序為「邊緣專業」者平均10.1年、「邊緣白領」者平均7.1年，以及「邊緣知識」者平均6.3年。

airi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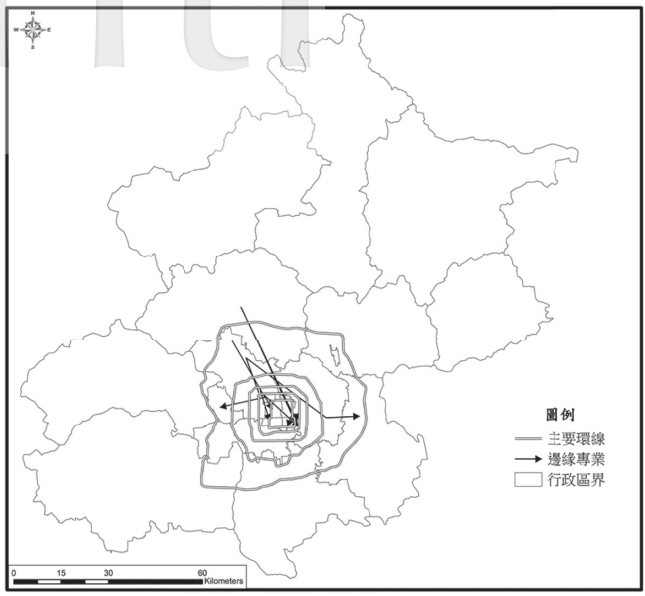

圖3　本研究「邊緣專業」空間流動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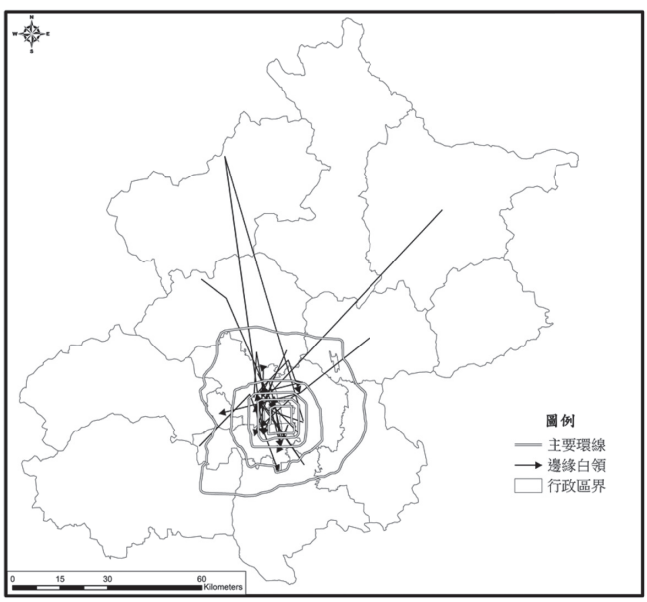

圖4　本研究「邊緣白領」空間流動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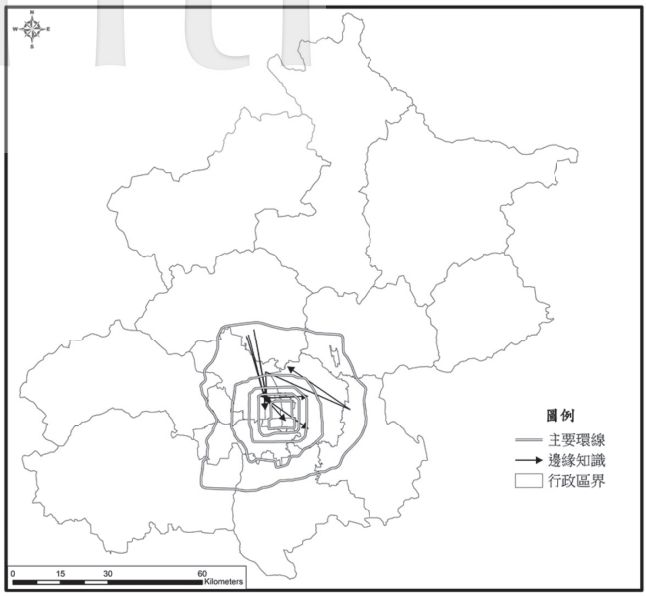

圖5　本研究「邊緣知識」空間流動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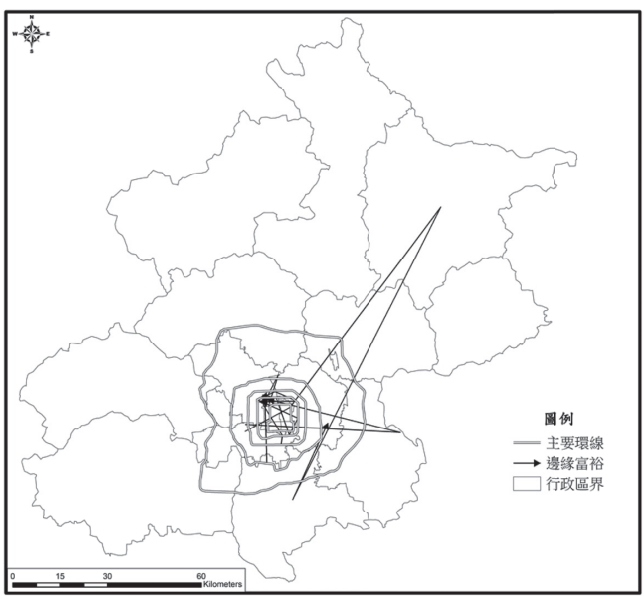

圖6　本研究「邊緣富裕」空間流動示意圖

airiti

是，在北京生活時間最長的「邊緣富裕」，他們的搬遷頻率最高，對未來的規畫是離開北京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回鄉發展。

此外，四組受訪者群體之空間流動路徑，也初步經過數化，如圖3-6所示。

另外，本研究經由疊圖分析四個受訪者群體間，比較彼此的搬遷地點區位順序，發現有四個組別的關係性，甲與乙組是空間流動路徑相似（見圖7）；丙與丁組則是空間流動路徑相反（見圖8）。甲組：「邊緣專業」與「邊緣知識」中多數人因求學來到北京，故居住點集中在西北邊大學集中的區位。在學業完成之後，因就業工作地點而搬遷。由於這兩類的群體工作性質多為IT以及專業服務業（如律師、會計、顧問公司等），因同質性較高的緣故，可以明顯發現二次搬遷的方向選擇往東南方向北京的商務中心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簡稱CBD）[6]移動；乙組：「邊緣白領」與「邊緣富裕」中，有些受訪者他們來京的第一個居住地是在距離市中心遙遠的郊區。「邊緣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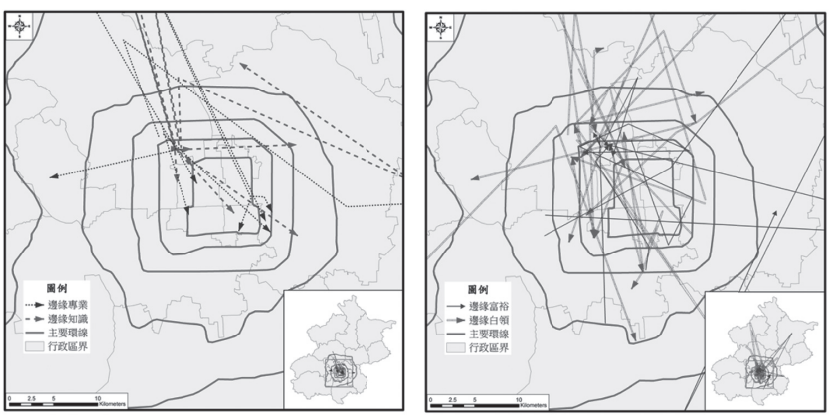

圖7　甲組：「邊緣知識」與「邊緣專業」（左圖）；
乙組：「邊緣白領」與「邊緣富裕」遷移路徑圖（右圖）

6　北京CBD位於北京市長安街、建國門、國貿和燕莎使館區的中心交匯區，是在東二環與三環之間的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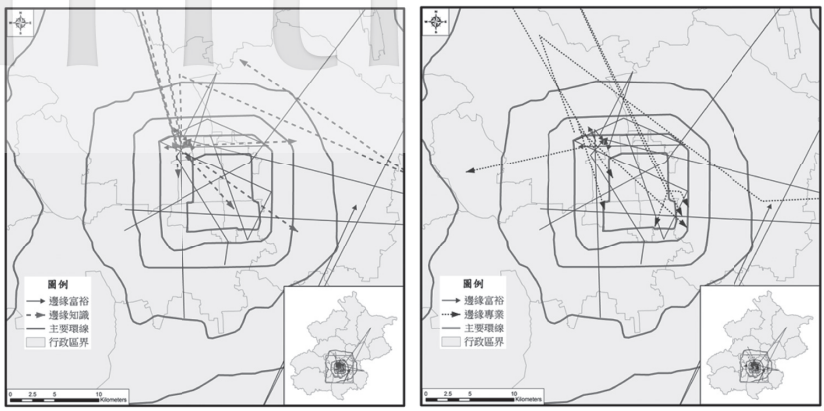

圖8　丙組：「邊緣知識」與「邊緣富裕」（左圖）；
丁組：「邊緣富裕」與「邊緣專業」遷移路徑圖（右圖）

領」的搬遷路徑明顯集中於北京西區，「邊緣富裕」的搬遷移動範圍及距離較大，甚至曾短暫居住於CBD地區，最後往西北邊大學區聚集，兩者的搬遷過程雖然不盡相同，但近幾年的居住有明顯集中於北京西區的現象。

丙組：「邊緣知識」與「邊緣富裕」，丁組：「邊緣富裕」與「邊緣專業」，兩兩之間呈現相反的遷移路徑。不同於「邊緣知識」與「邊緣專業」來北京求學的目的，「邊緣富裕」群體來北京的目的多是為了做生意，包括開設餐飲店、服飾店、以及生活用品店等，故選擇CBD周邊人潮較多的地方居住。隨著店租上漲成本提高而持續搬遷，近幾年有集中居住於大學區的趨勢。反之，「邊緣知識」與「邊緣專業」群體則是因學業完成後，紛紛至專業服務業工作機會較多的CBD周邊找尋工作，呈現兩者往相反方向遷移的路徑。

二、社會流動

本研究在抽取出意義單元，並逐步歸納為更大集合的次要主題，與最大集合的主要主題之外，並將四個群體的意義單元出現次數依

airiti

據高低以等級區分，依次從出現次數多的等級排列下來，共分為四級，[7]並從相同級數當中抽出四個群體當中都會出現的主題，也抽出四個群體中不會重疊的主題，以分析四個群體在北京生活經驗與自我身分定位的異同性（見表3）。以下先討論四個群組中，重疊的主題，從次數高的意義單元等級從A到D依序遞減；之後再討論不重疊的主題，呈現四組的差異性。

表3　重疊與差異的意義單元之等級劃分

次數等級	各組重疊的主題	各組差異的主題[a]
A	1. 就業優勢與挑戰 2. 去留北京的躊躇 3. 戶口得與失	1.「專業」：我不是中產階層 2.「白領」：房價壓力下努力留在北京 3.「知識」：對戶口逐漸看淡 4.「富裕」：事業可獲拓展但卻佈滿荊棘
B	1. 負面的階層認同 2. 在高房價間躊躇的居住選擇 3. 解決戶口的消極與積極策略 4. 消耗在吃與住當中的消費	1.「專業」：我不是中產階層 2.「白領」：房價壓力下努力留在北京 3.「知識」：對戶口逐漸看淡 4.「富裕」：事業可獲拓展但卻佈滿荊棘
C	1. 游刃有餘的中產階層被價格擠壓的居住條件 2. 困難度高而逐漸被忽略的戶口問題 3. 充滿機會卻不穩定的就業環境	1.「專業」：羨慕本地人無後顧之憂 2.「白領」：專業與心態促使遷移至北京 3.「知識」：在挑戰的工作環境中體會現實競爭殘酷
D	1. 住房選擇中的依賴與不安 2. 他鄉是他鄉：淡薄的歸屬感 3. 差異的消費	1.「專業」：去留北京中看見二線城市的發展性 2.「白領」：流變中的工作狀態

註：[a]各組名稱「專業」為「邊緣專業」簡稱，其他個組皆將「邊緣」二字省略做為表格與文內的簡稱。

7　本研究根據該意義單元出現的次數占所有意義單元編碼的百分比共定為四級，各級百分比標準分述如下。A級在2%以上，B級在1%以上，C級在0.6%以上，D級在0.4%以上。在四級之內的各意義單元，最高出現次數為25次，最少為2次。表中已經將類似的意義單元再度整併為主題呈現。

airiti

（一）重疊的主題分析

1.「就業優勢與挑戰」、「去留北京的躊躇」、「戶口得與失」

在意義單元出現次數最高的A級當中，「就業優勢與挑戰」、「去留北京的躊躇」以及「戶口得與失」是四組邊緣群體當中出現最多的主題。他們在遷移北京後，看見更多可能性與機會，以及野心勃勃的競爭者，還有源源不絕的工作機會。而一體兩面的是，他們也發現在這城市當中必須不斷充實奮鬥才能立足，因此有些人認為自己學歷不夠高，需要在北京多讀一個學位，才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們之中有人高頻率的換工作，薪資越來越高，職位也逐漸提升，但是在考慮未來發展的時候，仍然會在「北京不是永久依歸」、「在生活與工作之間協調」以及「回鄉是否為一種選擇」的躊躇中踱步。有些受訪者認為，儘管在北京生活多年，但是北京太大，房價太高，導致工作與生活的地方距離過遠，便利感降低，較遠的地方不想去，反而縮限了活動的空間。因此，是不是要一直留在北京，成為他們內心反覆牽掛的心事。尤其戶口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戶口得與失」的主題下，有些受訪者體認到有戶口會讓北京生活更加便利有優勢，但是辦理戶口的標準越來越嚴格，讓他們感受到背後牽連的福利所產生的不公平，都是他們在北京的生活感受。有些受訪者會認為北京不是永久的依歸，回鄉也許是一種選擇，因為基於情感落葉總要歸根，但是說起年輕回鄉的狀況，另一種猶豫又會油然而生。對他們而言，回鄉生活穩定而安逸，但是另一方面卻代表著停滯不前。整體而言，他們在北京的生活核心是就業，未來發展的地方，以及身分與福利的問題，所處的狀態是變動、不定，以及持續奮鬥。在高房價壓力下，多數受訪者未能在北京買下住宅安身立命，北京對他們而言，是工作但不是生活的地方。

airiti

2.「負面的階層認同」、「在高房價間躊躇的居住選擇」、「解決戶口的消極與積極策略」以及「消耗在吃與住當中的消費」

在意義單元出現次數最高的B級當中，「負面的階層認同」、「在高房價間躊躇的居住選擇」、「解決戶口的消極與積極策略」以及「消耗在吃與住當中的消費」是四組邊緣群體當中出現次多的主題。他們對中產階層的認定傾向於以經濟條件判斷，認為「是一定收入有車有房的群體」，而談到與自己的關係時，則認定自己是中下階層，或者直接將自己與中產階層劃清界線，認為自己的經濟條件與中產階層差距還很大。他們對於社會中階層差距的現象也有些觀察，提出「社會存在階級差距拉大的事實」的說法，認為北京的大資本家快速累積資本，很容易引發底層民眾的怨氣，但是這股怨氣不會直接影響大資本家，而是釋放到社會當中，產生一股不安的氛圍。這種階層的認定與經驗，與他們在北京的生存狀態有關。

「在高房價間躊躇的居住選擇」這個主題中，顯現他們在房價壓力下，若有能力買房，便是位在郊區，離工作單位遙遠的地方，忍受一天長達四到五個小時的通勤時間，否則就是放棄買房的想法，在靠近工作單位的地方租房，並且提心吊膽的看著房租快速上漲。戶口依然是問題，條件較好的「邊緣專業」抱持著較積極的策略，像是「到政府部門工作以解決戶口問題」；「戶口之外的生存之道」包括讓小孩讀私立學校，未來出國就學；或者在制度完善有健全保險的工作單位，繳交五年社會保險就有購房的資格；或者認為「條件好不因戶口而受影響」，「邊緣白領」傾向於等待居住證制度以取代戶口功能。其他群體在處理戶口的策略上較為消極，認為「戶口取得越來越困難」、「對戶口不抱期望」或者樂觀的看待，認為「有無戶口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因此不積極解決，而是採取觀望的態度。

此外，消費主題在這個層級中，集中在討論消費的比重以吃、

airiti

住兩者為重。受訪者認為整個城市的物價水準除了房價與房租較高之外，吃飯也是一個主要的負擔。有些受訪者認為，他們的收入花費在吃與住兩方面已經占據了相當比重，但另一方面他們卻認為整體物價並不算高。但有趣的是，他們也提到「日常生活以外的消費並不多」，也就是距離他們認定的中產階層定義：有一定收入且有車有房這樣寬裕的生活，的確有著相當的差距，在這樣的對比之下，並不難理解他們為何認定自己為中下階層。整體而言，這一層級的主題中勾勒了城市新移民一個圖像：承受高房價高消費與解決戶口壓力下的中下階層。

3.「游刃有餘的中產階層」、「被價格擠壓的居住條件」、「困難度高而逐漸被忽略的戶口問題」以及「充滿機會卻不穩定的就業環境」

在C級當中，「游刃有餘的中產階層」、「被價格擠壓的居住條件」、「困難度高而逐漸被忽略的戶口問題」以及「充滿機會卻不穩定的就業環境」是四組邊緣群體當中出現次數第三高的主題。在上一級的主題中，受訪者對階層的回應被歸納為「負面的階級認同」，而在這一個層級中，出現較多的意義單元是「平常開銷外還有剩餘的群體」、「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以及「未來有可能達到中產階層（以上）」，描述較傾向於「游刃有餘的中產階層」。在此顯示了有些受訪者的確對於社會階層流動保有期待，相信在北京生活能更達到這個目標。

居住壓力在這層級中依然是重點。在這個層級中，有些受訪者以生活的便利性為主要考量，先湊合著租一個床位或者跟他人共租房間，然後一步步地換租房子，因此他們的搬家頻率頗高，也因為常常要與人共租，因此他們租房子的選擇常與朋友介紹有關。也有受訪者將居住與找工作兩者合而為一，先行考量有提供住房的工作。在找房子的過程中，遇到詐騙的機會很多，所以他們會一直強調一定要找合法透明的仲介。另外，由於房租與房價上漲的速度實在太快，因此他們的訪談中

airiti

會出現有關「價格與方便性無法兼顧」的意義單元，顯示他們在價格壓力下必須做許多讓步，因此出現另一個相關聯的意義單元「忍受長時間通勤」。相較於B級意義單元當中所提到的高房價壓力，在這裡受訪者提出了價格壓力導致的其他困境，像是租房詐騙、租床位或與人共租、高頻率的搬家、找工作以提供住房的單位為優先等。

在這裡，戶口的主題集中在「戶口並非決定去留的因素」、「無戶口對北京生活不造成影響」以及「尋找戶口之外的生存之道」，儘管這些意義單元都是跟著「戶口取得越來越困難」、「標準嚴格無法符合戶口指標」、「戶口牽連社會福利」這些意義單元而出現，這也說明了受訪者他們如何從積極與消極的取得戶口策略到「困難度高而逐漸被忽略的戶口問題」。就業主題在這層級中凸顯了就業環境的不穩定性，受訪者提出了「自身的專業性限縮了城市的選擇」、「不易找到適合的工作」、「回鄉就業機會越來越多」、「不斷嘗試新的工作」等，歸納為「充滿機會卻不穩定的就業環境」。整體而言，在C級當中顯現一些受訪者在北京較為消極的生存態度，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社會階層流動對他們而言依然是充滿著可能性，但是另一個有趣的討論是，他們認為的社會階層流動，並非一定發生在北京，因為持續的空間流動，包括到次級城市或者回鄉，都是他們的選擇，這是否意味著社會階層向上流動，也產生了空間上的流動性。

4.「住房選擇中的依賴與不安」、「淡薄的歸屬感」以及「差異的消費」

在D級當中，「住房選擇中的依賴與不安」、「差異的消費」以及「淡薄的歸屬感」是四組邊緣群體當中出現最少的主題。有關高房價的主題，在前面兩級的意義單元中都已經出現，但在這裡出現較為不同的意義單元，包括：「家人幫助是必要」、「限制了區位的選擇」、「租房市場不安全」等。顯現在居住選擇過程中，有些受訪者在租房上害怕被租屋市場中不透明的交易，有些決定要買房的受

airiti

訪者，在單位的公積金與私人的商業貸款外，得需要透過家人的幫助才能順利在郊區購屋。這些意義單元整合為「住房選擇中的依賴與不安」，代表這一層級的受訪者顯現的居住經驗。

前面層級中提到消費水準並不特別高，且多用在吃與住上。在這裡，受訪者強調「消費與收入不成比例」以及「區位的消費水準差異」。受訪者特別指出消費之所以與收入不成比例，與在哪裡消費有關。例如「專業」與「白領」群體較有機會到北京的世貿一帶工作與聚會，那裏的消費水準較一般城郊住宅區的價格差異頗大。因此，這裡的主題提供了消費水準區域差異的概念。

此外，這裡出現關於城市新移民在北京社會網絡的討論。有些受訪者提及在北京的交友圈主要是老鄉，對北京本地人並無太多刻板印象，但是他們卻很清楚自己並沒有本地人的優勢，同時對這個城市也未產生歸屬感。這意味著城市新移民儘管在北京已經生活工作多年，老鄉或者其他新移民才是他們主要的社會網絡，他們稱這樣的群體是奮鬥的階層，儘管不像北京本地人不需為房子擔憂，也沒有戶口的煩惱，生活較為安逸，但是他們強調自己在這過程中真實的存在感。整體而言，這個層級的主題呈現了城市新移民「缺乏（居住與消費）自主性與疏離感城市生活」。

重疊的主題顯現了城市新移民在北京，工作是生活的核心議題，這是他們來到北京的目的，也因此體會到北京的充滿機會與挑戰，使他們一方面積極奮鬥，一方面則衡量自己的條件，以及在社會上的階層位置。其中影響至深，引起他們關注最多的是居住、消費與戶口。高房價、高租金，限縮了他們的居住選擇；消費水準對他們而言儘管客觀來說不算太高，可是他們的收入當中吃與住的開銷比例高，使他們幾乎少有其他的消費；戶口的問題從積極想策略，消極等機會，逐漸轉變成不太在乎，因為北京戶口離他們越來越遙遠，他們一方面認為不公平，另一方面覺得有無戶口之間似乎也影響不了他們去留北京的決定，總之，要留下來就得去想辦法，若留不下來，回鄉或到次一

airiti

級的城市發展也未嘗不可。畢竟，在居住選擇與消費上缺乏自主性，北京又是一個工作而非生活的城市，社會網絡的流動性使得疏離感不曾消失。因此，這不是一個非得留下來的地方，離開也不代表社會階層的流動即將停止，北京是一個提供他們機會，改變現狀，積極奮鬥，朝向更好的自己與更好生活的城市，但這些經驗也許讓他們在另一個地方繼續積累，並讓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成為可能。

（二）相異的主題

1. 邊緣專業群體

除了上述相互重疊的主題之外，四個邊緣群體之間在A級的主題當中有些差異（見表3）。「邊緣專業」群體（以下簡稱「專業」）中，較其他組別出現更多的主題為「我不是中產階層」。在「專業」群體的受訪者中，他們幾乎是非常簡潔明確的宣稱自己不是中產階層，並且批評媒體對於專業階層的描述過於誇大不實，甚至有些受訪者直接的說，他們是無產或者中下階層。若比對「專業」群體在A級的其他主題，這樣的階級認同狀態，與他們目前呈現的主題：「北京不是永久的依歸」與「生活與工作之間協調不易」的困難面產生一致性。但是，在這面向外，「專業」群體的積極面是在就業經驗中「看到更多可能性與機會」以及在住房選擇上努力「以工作單位為區位選擇」。

在B級的主題中「其他大城市也是一種選擇」，以及D級「去留北京中看見二線城市的發展性」，都是「專業」較其他群體突出的主題。他們之中有人認為自己重視工作，因此如果有如上海、廣東一帶有比較好的工作機會，也會考慮再度遷移。有受訪者認為，北京太過浮躁了，每天穿梭在上下班壅塞的交通中，若自己在工作上發展不特別好，相較於付出的代價太大，就應該要去其他大城市求發展。另外一些受訪者覺得，相較於「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的擁擠與

airiti

高消費，二線城市以及一些省會城市的空氣品質好，房價較低，壓力相對較小，而越來越有吸引力，使得離家鄉近的二線城市成為北京之外的一種選擇。根據本研究「專業」群體受訪者中基本資料，他們來自城市與城鎮的人數各半，但無人來自農村，區位分佈於東北、華北、華東及華南沿海省分，因此可以解釋他們對其他大城市或二線城市並不陌生的緣故。此外，本研究「專業」群體在北京的空間流動主要從西北向東南移動，也就是從他們就讀大學的區位往CBD移動，呈現以工作為主的空間流動方向，與他們將其他大城市與二線城市列為下一個遷移的地方的理由類似。

「專業」群體在北京最關心的是自己的事業發展，而對於自己因身分差異而影響自身條件的認知，也出現在C級的主題「羨慕本地人無後顧之憂」之中。他們之中有些人覺得，北京本地人在養老保險領回的金額上比起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要更為優厚，因為外地人將來只能領取個人繳交的部分，而公司繳交的其實才是大宗，卻無法領回。除此之外，北京本地人若家裡條件還不錯，不想努力就可以安然度日，因為不需要擔憂住房，承受的壓力也就比外地人要小許多。

帶著專業能力與較高的文化資本的「專業」群體移入北京的生活核心是事業發展，他們一方面積極尋找機會並努力奮鬥，期待有更高的成就與社會地位。但是對目前的社會階層與北京生活並非感到安定與滿足，並且也感嘆身分（戶口）帶來的資源差異，使他們沒有安逸的本錢，或者成為社會流動的阻礙。因此，空間流動成為一種策略，他們認為如果在其他城市有更好的工作發展機會，再次的空間流動可以換取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再次的移動」，是「專業」群體在北京生活經驗中呈現的積極策略。

2. 邊緣白領群體

「邊緣白領」群體（以下簡稱「白領」）較突出的主題為「房價壓力下努力留在北京」。「白領」在收入與職業階層上都略低於「專

airiti

業」群體，留在北京的時間也較「專業」群體短，他們所承受的房價壓力不亞於其他群體，但是他們之中許多認為，一步步來，咬牙撐過去，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工作與生活，能為孩子的未來尋求更好的機會，就是他們努力留下來的目標。

此外，從B級到D級中，「白領」群體較為突出的主題都與就業相關，包括「充滿機會與公平的就業環境但不具前瞻性」、「專業與心態促使遷移至北京」以及「流變中的工作狀態」。他們認為北京是個充滿機會的城市，但是對目前自己工作未來的展望並不看好，有些受訪者覺得在大公司分工太細，技能專一，使得訓練不夠全面，例如：技術人員也能夠學習管理能力。也就是，他們仍然認為透過工作累積能力，才是具有前瞻性的工作，而不只是以時間換取金錢，但目前尚未達到這個標準，並且不認為這樣的工作能夠持續下去。

根據他們的空間流動資料顯示，他們第一次居住的地方離市區較遠，而後來集中在北京西半部，顯示他們第一次來北京並非讀大學或研究所，而是為了工作而來北京。並且，他們從事與IT相關的工作較多，因此遷移的範圍一直集中在北京西半部IT產業興盛的中關村附近。這是他們當初來到北京，主要是因為本身的專業條件在北京這個第三級產業為主的城市裡較能找到工作機會，另外，是他們希望能改變當時較為穩定的生活狀態。目前他們當中有72.4%為未婚，年齡多在21-30歲之間，變動的生活狀是他們的節奏。到了北京之後，他們工作換得頻繁，有趣的是「回鄉」的念頭在這群體中並不突出。他們之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來自農村，以華北與華中地區居多，其中河北省最多，鄰近超級大城市的吸力與交通的便利性使得「回鄉」發展的吸引力降低。跟其他群體相比，「白領」是唯一期許自己未來有機會達到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8]並且他們認為這樣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會在北京實現。

8　在C級的重疊主題中，有關「階層的自我認定」，「白領」出現了「未來有可能達到中產階層（以上）」的意義單元。

airiti

3. 邊緣知識群體

「知識」群體最為凸顯的主題是「對戶口逐漸看淡」。他們在北京的平均時間最短，多在北京就學後就業，其中許多受訪者還在剛入職場的階段。他們在學時，戶口外掛在學校，畢業工作後有些戶口尚未遷回老家。他們之中有將近90%的人屬於城鎮與農村戶口，有機會在北京就學後留下來，原本應該是由於他們在北京的工作年資較短，在北京戶口申請標準越來越嚴格的狀況下，對北京戶口的期待就隨之減退。在「對戶口不抱期望」以及「戶口不是重要的問題」都是「知識」群體中出現高次數的兩個意義單元，意味著戶口對他們在北京發展的影響已經逐漸減少。

在B與C級中，「工作優勢與挑戰並存並且需要付出相當代價」，以及「在挑戰的工作環境中體會現實競爭殘酷」這兩個與工作挑戰與競爭相關的主題，在「知識」群體中較為突出。在工作優勢方面，是北京能提供他們豐富的資訊與資源，像是有機會接觸到比較多不同的人，使他們可以從別人的經驗中獲得工作需要的能力。因此對他們而言，所謂的資源與資訊都與大城市當中人才濟濟有關。而需要付出的代價以及現實競爭的殘酷，是「需擴展人際網絡」、「學非所用的工作」等。他們覺得在北京較有規模的公司常以團隊為單位工作，因此需要學習與不同的人合作，即便是不想做的事情也要學習如何配合。此外，由於他們進入職場時間不長，許多人擔任基層行銷工作，這些都讓他們體悟到人際網絡的重要性。這一年輕的族群在北京偌大的城市中，即使工作機會多如牛毛但多半是學非所用，為了工作而工作的受訪者，對目前的狀態充滿浮動的不確定感，不斷學習成為他們在北京生存的不二法則。

對戶口的不抱期望與輕忽，與他們群體的特徵有關。年輕、甫自大學畢業、未婚、租房等條件，他們尚未找到較有規模的工作單位與職位，在戶口限制極為嚴格的北京市，自知機會渺茫。再者，未婚與

airiti

租房的狀態，使他們尚未直接體驗到有無戶口對他們生活與機會的影響。在競爭激烈與生活一切尚未穩定的狀態下，戶口問題自然不在關照的範圍之中。

4. **邊緣富裕群體**

「富裕」群體比較顯著的是有關就業的經驗，其中「事業可獲拓展但卻佈滿荊棘」是突出的主題。「富裕」群體主要是在北京停留時間最長，學歷相對較低，職業主要是從事自營商店為主，受訪者中75%是農村戶口。他們在北京闖蕩多時，由於多半篳路藍縷，需承擔較高的風險，像是承租店面對合約不甚瞭解而被欺騙等。但是，另一方面，「富裕」群體中有關於「工作獲得提升」也是重要的意義單元，意味著相較於他們較低的文化資本，儘管來到北京工作陌生的環境存在不少風險，但是對於職業地位的提升仍有一定的幫助。在B級的主題中，凸顯了「富裕」群體對於本地人居住條件優勢的觀點。「缺乏本地人在居住條件上的優勢」中，他們提到本地人「較無需擔憂房子」，並且「能從拆遷中獲得暴利」。在他們的眼裡，北京本地人的富裕生活並不是因為努力，是一個時代的機遇創造而來，拆遷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不需要擔憂房子，就算房子被拆遷了也能獲得高額補償，因此他們在工作上並不需要太過努力。對照自己，則是一直在移動中努力尋找機會、嘗試錯誤與面對風險。從農村一路披荊斬棘，來到北京最久的群體，背負著一個家庭的生計、未來的生存、孩子的就學，他們對於有北京戶口的本地人所享有的條件格外有感。

根據「富裕」群體在北京空間流動的路徑，他們搬遷移動的範圍較其他群組大，距離較遠，中間短暫居住在CBD區，最後往北京西北區域聚集。由於他們來北京的目的是做小生意，因此店租與人潮都是促使他們再度遷移的因素，因此CBD的人潮較多，但是隨著租金的上漲，他們必須尋求其他的地點。由於受訪者中，有幾位是在北京西北邊大學聚集的區域開店，位在一座商場一樓的店鋪。由於商場一直有

airiti

拆遷的風聲，因此也讓他們的生意與規畫受到影響。他們的空間流動隨著店租到期或者拆遷若執行再次開啟下一次的搬遷，而未來的生意將在北京或者在其他城市，他們並沒有定見，不過北京快速上漲的租金，使部分受訪者直呼他們得離開北京。「富裕」群體有披荊斬棘的企圖心，北京是一個讓自己透過工作較快累積資本提升社會階層的方法，另一方面對照著北京當地人因身分差異連帶獲得的優勢，以及面對接踵而來的迫切壓力，因此持續的空間流動則成為他們往後的生命路徑。

伍、結論與討論

根據上述的分析並再次歸納，本研究提出社會流動因子的影響，以及空間流動的歷程與影響，並透過列表得出關係。列表中，社會流動因子的影響包括「文化資本的增加」、「成就的提升」、「面對戶口問題的評價」；空間流動的歷程與影響則包括「過去移動」、「後續移動」以及「移動帶來的影響」。「＋」代表對該因子或歷程與影響呈現正向反應，而「－」則是負向反應，「○」是折衷反應（見表4）。

社會流動的因子中，有關「文化資本的增加」，許多「專業」與「知識」群體皆因為移入北京就讀大學或研究所，因而增加文化資

表4　社會流動因子與空間流動歷程之影響

	社會流動			空間流動		
	文化資本的增加	成就的提升	面對戶口問題的評價	過去移動	後續移動	移動帶來的影響
專業	＋	＋	－	○	＋	＋
白領	○	＋	○	＋	－	○
知識	＋	－	○	○	○	○
富裕	○	＋	－	＋	＋	＋

airiti

本，「白領」與「富裕」群體多是為了就業而到北京。「成就提升」上，只有「知識」群體對於目前的成就有較多負面評價，他們覺得自己無法確定是否提升。儘管其他群體對北京的就業機會與資源帶來的結果有負面評價，但是整體而言，他們對自己目前成就感到有所提升。關於「面對戶口問題的評價」，「專業」與「富裕」傾向於認為沒有北京戶口使他們在這裡的發展受到限制，尤其與有北京戶口的當地人相比更是如此。而「白領」與「知識」群體認為北京戶口的有無之間差距不大，並不影響他們留在北京發展的意願。

空間流動的歷程與影響中，「白領」與「富裕」在北京曾經經歷較長距離的遷移，因此「過去移動」上出現「＋」，而「專業」與「知識」則因為多為就學來到北京之後在特定服務業聚集的區位工作及居住，因此遷移的路徑相對較短。「後續移動」上，「專業」與「富裕」群體強調他們未來將繼續移動，包括到其他大城市、次級城市或者回鄉，而「白領」群體則傾向繼續留在北京發展，「知識」群體較少提及未來是否繼續移動。最後，「移動帶來的影響」上，空間流動成為社會流動的資本者包括「專業」與「富裕」群體。「專業」群體認為未來繼續移動代表有更多發展機會在其他地方；「富裕」群體過去經歷較長距離的遷移，未來也認為會繼續遷移。以上兩個群體在「成就提升」上呈現正向反應。此外，「白領」群體經歷過較長距離的遷移後，認為北京是一個他們可以留下來繼續努力的城市，因此過去的空間流動成為在北京的資本，但未來繼續流動的傾向不明確，目前他們期待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發生在北京；對「知識」群體而言「未來是否繼續遷移」並非重要的主題，從過去的遷移經驗以及對成就的評價，空間流動對「知識」群體的影響仍然不明。綜整上述的結論，我們將他們的空間與社會流動建構出一個矩陣關係圖（見圖9）。

本文將這一結果與空間流動理論對話。如同文獻中提及現有相關研究中討論了空間流動中再生產不公平的現象，因此有社會階層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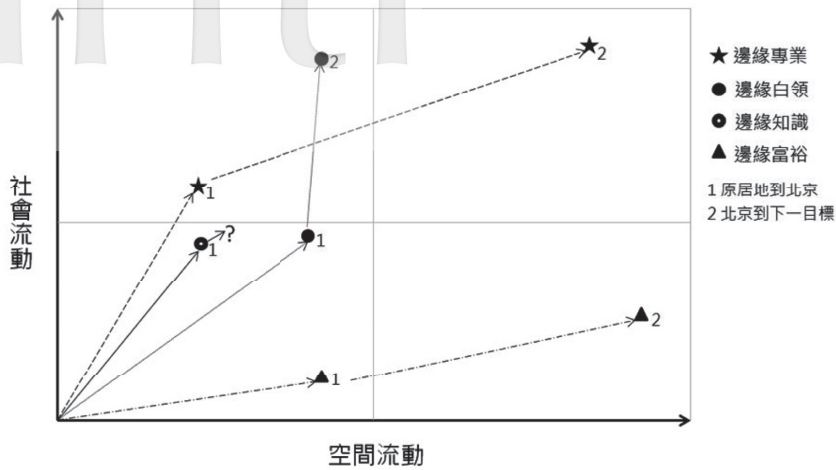

圖9　四個群體社會流動與空間流動關係示意圖

高者，更有移動的條件，並且透過空間流動累積資本達到社會階層向上流動。但是在一個社會當中，階層最高者與最低者，其空間流動皆不再能影響社會流動。前者因為已經達到社會階層的頂端，後者則是遭到社會排除無法透過空間流動積累資本。這樣的論述與本研究結果互異，我們發現在本研究的城市新移民這樣的邊緣中產階層中，掌握較多文化資本的「專業」群體與最少文化資本的「富裕」兩個群體是最能在空間流動中累積資本繼續移動。同樣擁有較高文化資本的「知識」群體則因移動的經驗都與就學有關，因此他們的空間流動並無法成為目前社會流動的資本。不過，這樣的結果呈現了北京中產邊緣階層的特殊現象，在戶籍制度產生集體排除的狀態下，對戶籍制度有較多負面感受者，他們更傾向於透過空間流動來尋找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可能，文化資本則無法成為城市新移民社會流動的關鍵因素。反之，對戶籍制度逐漸漠視或者順從制度的壓力者，繼續透過移動累積資本的可能性較小。但是這與受訪者他們過去的移動經驗，以及家鄉所在地屬於農村或城市（鎮）也有關係，因此，城城遷移以及城鄉遷移這兩種不同的遷移路徑，也值得在後續研究中加以分類討論。

airiti

在本研究中另一值得關注的結果是，「成就的提升」與「面對戶籍的評價」皆呈現負向反應的「專業」與「富裕」群體，在「後續移動」的反應也是正向的，這是其中一致性最高的關係。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戶籍制度的限制，並不減損受訪者對於移入北京的成就評價，並且有更高的意願繼續移動，而究竟是因為對戶籍制度的不滿增加移動的動機，或是因為移動的能力較高而能打破戶口對他們發展的限制，在研究中並無法下定論，這可以成為後續討論的議題。但是，在「青年藍皮書」以及相關的戶籍制度學術文獻中指出戶籍障礙對城市新移民的巨大限制，使他們無法獲得住房保障，無法承擔在城市中的生活費用，尤其龐大的住房費用，而造成處於弱勢走上貧窮循環之路，以及社會階層不流動的後果，否則就必須依賴家庭的經濟支持，無法依靠文化資本達到社會流動的目的。本研究中四個群體的共同主題中，有關於「房價過高」的主題重複出現，是他們在北京共同承受的壓力，並且比戶口問題更受到重視。「專業」與「富裕」群體中有些受訪者有買房的打算，前者要靠家人幫忙，或者再到其他次級城市發展後買房；而後者則考慮在老家買房，或者老家已經有房。「白領」與「知識」群體主要仍在討論租房的階段當中。從本研究以及過去相關研究，住房壓力、戶口限制以及繼續移動，三者之間的關係探討，可以成為我們理解處在邊緣中產階層的城市新移民一個觀察的切入點。

最後，回到本文起點的詰問：處在邊緣中產階層的城市新移民能否成為中國擴大中產階層的儲備軍？本文以「流動」這個關鍵概念來解析，北京是個使人流動的城市，一些人移入，駐足，然後離開，另外一些人則留下來成為城市中永久的一員。空間流動儘管有各自的方向，對他們來說社會階層不論如何定義，自己都屬於中下階層，但是在這比對過程中，他們心中正映照著一個想像或經驗過的城市中產階層樣貌，他們隱晦不明地描繪未來憧憬，但卻透露對機會追逐的企圖。所以有些人繼續移動追求那些可能提升社會階層的機會，有些則

airiti

認為自己在這裡看到機會而留下來，有些則還未決定去留的觀望著。近來北京市政府對南五環大興區社區內的流動人口進行限時驅趕，並以掃除「低端人口」，維護社會安全來合理化這次行動。這簡單的治理邏輯，卻讓這群包含著邊緣中產階層的「低端人口」（Buckley et al. 2017)，在去留北京之間更夾雜著不安、憤怒與無奈。諷刺的是，在研究過程中受訪者普遍以「中下社會階層」來描述自己在北京的社會地位，原本看似一種對自我在北京現狀的揶揄，但是這波驅趕行動的確揭示了一個事實，北京想要擴大的中產階層，終究畸形地排除了大部分邊緣中產階層，而他們正是維持「高端人口」所生活的城市正常運作的人口。最終，以國家尺度來看，邊緣中產階層將需持續移往提供社會階層流動的地方，而試圖躋身中產階層。若以城市尺度觀之，城市內部的政策與市場所形成的推力，將迫使一些邊緣中產階層往其他地方移動，使它成為始終缺乏認同，無提供新移民安身立命的城市。而「擴大中產階層」要召喚的群體，隨著城市治理的情緒波動，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在去留之間漂流。

謝誌

本文接受科技部專案計畫補助，計畫名稱：「『擴大中產階級』如何可能？北京城市新移民的空間與社會流動之辯證關係（II）」（編號：MOST 104-2410-H-018-037）。作者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建議，以及北京財經大學李香香、胡元潔在田野調查上的協助，廖又闓及宋承恩協助資料蒐集與繪圖編修。北京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耐心回應並提供他們的遷移經驗，在此一併致謝。

airiti

參考文獻

人民網（2012）統計局：十六大以來我國人口總量平穩增長就業局勢穩定。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817/c1004-18769491.html（取用日期：2017年10月2日）。

人民論壇網（2013）聚焦「新」城市移民。http://www.rmlt.cn/News/201307/20130718161407 4453.html（取用日期：2013年7月18日）。

王信賢、張弘遠、張執中（2011）大陸「中產階層」的形成與影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

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取用日期：2017年6月23日）。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6）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發佈。http://www.stats.gov.cn/ztjc/zdtjgz/zgrkpc/dlcrkpc/dcrkpcyw/201104/t20110428_69407.htm（取用日期：2016年9月16日）。

朱迪（2013）城市化與中產階層成長——試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論擴大消費。江蘇社會科學，3: 70-76。

李春玲（2011）中國中產階層的發展狀況。黑龍江社會科學，1: 75-87。

李姿瑩（2016）透過導引式省思協助口譯員培訓：個案研究。翻譯學研究集刊，20: 75-96。

李強（2017）中產過渡與中產邊緣層。江蘇社會科學，2: 1-11。

李強、王昊（2014）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四個世界。社會科學戰線，9: 174-187。

李培林、張翼（2008）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認同和社會態度。見李

airiti

春玲主編，比較視野下的中產階層形成，頁102-10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

吳啟焰、劉春卉（2015）邊緣化新白領的中產階層化研究：內容、理論構架與未來。人文地理，1: 40-44。

李曉壯（2017）北京流動人口結構性特徵及對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11: 4-16。

杜鵬、李一男、王澎湖、林偉（2008）城市「外來藍領」的就業與社會融合。人口學刊，1: 3-9。

林秀娥、趙祥和（2015）獨居老年長者之心理需求探究。臺灣老人保健學刊，11(2): 80-100。

高淑清（2008）質性研究的18堂課——首航初探之旅。高雄：麗文文化事業。

陳金永（2013）戶籍改革路線圖。新世紀周刊，18: 20-21

陸學藝主編（2010）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張耀蘭、李方軍（2013）城市高知「雙漂族」困境。財經國家周刊，25: 39-47。

賀雪峰、袁松、宋麗娜（2010）農民工返鄉研究。濟南：山東人民。

賀雪峰、黃磊明（2009）農民外出務工的邏輯與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中國農村觀察，2: 12-18。

項飆（1993）北京有個「浙江村」：社會轉型中一個自發城市化群體的初步研究。社會學與社會調查，3: 68-74。

廉思（2013）青年藍皮書：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廉思（2014）青年藍皮書：中國青年發展報告No.2：流動時代下的安居。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新華網（2012）新華觀點：從十八大報告看改革指向。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2/c_113666601.htm（取用日期：2013年9月9日）。

airiti

劉于琪、劉曄、李志剛（2014）中國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願及其影響機制。地理科學，34(7): 780-787。

羅遐（2011）流動與定居——定居農民工城市適應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邊燕杰、吳曉剛、李路路主編（2008）社會分層與流動——國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新進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Axhausen, K. W. 2002. "Social Networks and Travel Behaviou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SRC Workshop: Mobile Network Seminar Series. Cambridge, UK, February.

Bauman, Z. 2003.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Beck, U. 2008. "Mobility and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Pp. 25-36 in *Tracing Mobilities: Towards a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edited by S. Kesselring, W. Canzler, and V. Kaufmann. Burlington, VT: Ashgate.

Breen, R.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Weberian Class Analysis." Pp. 31-50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 O. Wrigh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Buckley, C., S. L. Wee, and A. Wu. 2017. "Campaign to Drive Out Migrants Slams Beijing's Best and Brightes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1/world/asia/china-beijing-migrants-tech.html

Cass, N., E. Shove, and J. Urry. 2005. "Social Exclusion, Mobility and Acces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3(3): 539-555.

Chan, K. W. 2010. "Fundamental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Policy." *The China Review* 10(1): 63-94.

Chan, K. W. 2011.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Trends, Geography and Policies." Pp. 81-109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Urbanization, Inter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iriti

edited by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Chan, K. W. 2012. "Crossing the 50 Percent Population Rubicon: Can China Urbanize to Prosperit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3(1): 63-86.

Chan, K. W. 2013. "Turning China's Migrant Workers into Middle Class is Good for the World." In *Context China*. http://contextchina.com/2013/01/qa-turning-chinas-migrant-workers-into-middle-class-is-good-for-the-world/ (Date visited: June 23, 2013).

Cresswell, T. and P. Merriman. 2011. "Introduction: 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 Practices, Spaces, Subjects." Pp. 1-18 in *Geographies of Mobilities: Proactices, Spaces, Subjects*, edited by T. Cresswell and P. Merriman. Burlington, VT: Ashgate.

Faist, T. 2013. "The Mobility Turn: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al Scienc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6(11): 1637-1646.

Fan, C. C. 2002. "The Elite, the Natives, and the Outsiders: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2(1): 103-124.

Fan, C. C. 2008.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London: Routledge.

Jackson, E. 2012. "Fixed in Mobility: Young Homeless People and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6(4): 725-741.

Jaffe, R., C. Klaufus, and F. Colombijn. 2012. "Mobilities And Mobilizations of the Urban Po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6(4): 643-654.

Kaufmann, V., M. M. Bergman, and D. Joye. 2004. "Mobility: Motility as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Regional Research* 28(4):

airiti

745-756.

Lanham, M., K. L. L'Engle, M. Loolpapit, and I. O. Oguma. 2012. "Women's Roles in Voluntary Medical Male Circumcision in Nyanza Province, Kenya." *PLOS ONE* 7(9): e44825.

Li, S. M. 2013.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A Relatively Neglected Topic in Urban China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rban China Research Forum. Kowloon, Hong Kong, November 19.

Logan, J. R., Y. Fang, and Z. Zhang. 2009. "Access to Housing in Urb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4): 914-935.

Sheller, M. and J. Urry. 2006.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38(2): 207-226.

Sitas, N., H. E. Prozesky, K. J. Esler, and B. Reyers. 2014.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Mainstream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Development Planning: Perspectives from a Landscape Level." *Landscape Ecology* 29(8): 1315-1331.

Smart, A. and J. Smart. 2003. "Urbanization and the Glob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2: 263-285.

So, A. Y. 2003.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Classes and Class Conflict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3(3): 363-376.

So, A. Y. 2013.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Taubmann, W. 2000. "Urban Administrati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Migrant Enclav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source Management, Urb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Zhujiang Delta. Shatin, Hong Kong, May 23-24.

Urry, J. 2010. *Mobili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Wang, Y. P., Y. Wang, and J. Wu. 2009.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l

airiti

Development in China: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4): 957-973.

Whyte, M. K. 2010a.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Whyte, M. K. 2010b. "The Paradoxes of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1-28 in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M. K. Why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u, F. 2004. "Urban Poverty and Marginaliz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2): 401-423.

Wu, F., F. Zhang, and C. Webster. 2013. "Inform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Demolition of Urban Villages in the Chinese Peri-Urban Area." *Urban Studies* 50(10): 1919-1934.

Wu, W. 2006. "Migrant Intra-Urban Residential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Housing Studies* 21(5): 745-765.

Zhang, L. (2008) "Conceptualizing China's Urbanization under Reform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2(4): 452-470.

附錄：本研究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P1	女	31-40	已婚	碩士	32以上／3	英商律師	朝陽雙井	自有	不確定	城鎮	江西—浙江—江西—上海—	2007工作	建國門—永安里—雙井（購屋）都在建國門一代，因工作地點的緣故
P2	女	21-30	已婚	碩士	28-31.9／2	軟體技術人員	宣武廣安門外大街（西二環）	自有	不確定	城鎮	吉林	2008讀書	中關村床位—中關村合租—中關村合租—廣安門外大街（結婚購房）
P3	男	21-30	未婚	碩士	16以上／1	律師	朝陽勁松	租房	不確定	城市	江西—珠海	2004讀書工作	北京政法大學（昌平）宿舍—朝陽勁松（國貿南）
P4	女	21-30	已婚	碩士	32以上／2	律師	東城區崇文門廣興二環南	租房	是	城鎮	山東煙臺農村	2005讀書工作	北京政法大學（昌平）宿舍—建國門外—崇文門廣興門（二環南）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P5	男	21-30	已婚	大學	32以上／2	文化公司策劃總監	通州東關運河	自有	是	城鎮	北京—河北邯鄲—北京	2005讀書工作	中國人民大學宿舍—西北五環六環—雙橋—通州（買房）
P6	女	31-40	未婚	碩士	16以上／1	企業主管	大興區南六環	自有	不確定	城鎮	遼寧	2004讀書工作	朝陽區（搬家四次）—大興區
P7	女	31-40	已婚	大學	32以上／4	私企財務	昌平區天通苑	自有	是	城鎮	湖北武漢	2006工作	通天苑（租兩次房）—通天苑（買房）
P8	男	21-30	未婚	大學	32以上／1	國企職員	石景山區（西四環）	租屋	不確定	城市	江西南昌（天津戶口）	2007上學 2011工作	海淀區上莊（北五環）—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石景山區（西四環）
P9	男	21-30	未婚	碩士	32以上／3	證券公司投行	西城區（南二環至南三環）	租屋	是	城市	浙江嘉興	2012上學 2015工作	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西城區（南二環至南三環）
P10	男	31-40	已婚	大專	32以上／3	IT技術人	海淀區上地（北四）	租屋	是	—	河北張家口	2007工作	海淀區上地（北四環）（搬家三次）
P11	男	31-40	已婚	碩士	32萬以上／3	IT技術人員	朝陽潘家園	租屋	不確定	城鎮	黑龍江哈爾濱	2006工作	海澱人大附近—朝陽潘家園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W1	男	21-30	已婚	大專	16-19.9／3	軟體技術人員	豐台太平橋西三環	租屋	是	城鎮	河北石家莊	2009工作	東三環有村—東邊—豐台太平橋
W2	女	21-30	已婚	大專	20-23.9／2	小額信貸sales	豐台太平橋西三環	租屋	是	城鎮	河北廊坊	2009工作	潘家園東三環（東南）—中關村—豐台太平橋
W3	男	21-30	已婚	大學	20-23.9／2	小額信貸sales	豐台太平橋西三環	租屋	是	農村	河北保定	2009工作	海淀北五環上地—西二環邊上—豐台太平橋
W4	男	31-40	未婚	碩士肄業	16及以上	私營企業財務總監	海淀區北大南門（北四環	租屋	不確定—其他城市	農村	貴州凱裡市	2002 上學 2008工作	南三環—北四環—中關村
W5	女	21-30	未婚	大專	4-5.9	飯店前臺領班	海淀魏公村北外	公司宿舍	否	城鎮	河北保定高碑店市	2008工作	朝陽三環—海淀北京外國語大學職工宿舍
W-6	女	21-30	未婚	高中	4以下	飯店前臺	海淀為公村北外	公司宿舍	否	農村	甘肅農村	2009工作	海淀魏公村北外留學生公寓職工宿舍
W7	男	21-30	未婚	大學	10-11.9	軟件開發	海淀蘇州街	租屋	不確定	城鎮	山西-大連	2009工作	人民大學西小南庄—人大南邊三義廟—海淀蘇州街（未來有可能在北京買房）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W8	男	31-40	未婚	大學	10-11.9	軟件開發	豐台六里橋	租屋	否	城市	武漢附近城鎮	2007工作	望京—西壩河（北三環）地下室—六里橋（西三環）
W9	女	21-30	未婚	大專	4以下	待業中	河北保定	與父母同住	否	農村	河北保定	2012工作	密雲—魏公村—亦庄—蘇州街—天通苑—望京（東四環）
W10	男	21-30	已婚	大專肄業	8以下／3	飯店前臺	海淀魏公村	公司宿舍	否	農村	河北	2007工作	西三環—北外留學生公寓職工宿舍
W11	女	21-30	未婚	大學	6-7.9	財務會計中級	豐台區新宮南（南五環）	租屋	是	城鎮	河南小城鎮	2011工作	二環以南—崇文門（東南二環）—南四環—新宮（南五環）
W12	女	21-30	未婚	大學	4-5.9	財務會計	海淀石景山	租屋	不確定	農村	河北滄州	2008讀書工作	順義—望京—海淀石景山（五環）
W13	女	21-30	未婚	大專	6-7.9	財務會計初級	大興（南五環）	租屋	是	農村	河北張家口壩上	2010工作	豐台（西六環）—海淀—大興（南五環）
W14	女	21-30	未婚	大學	4-5.9	財務會計初級	豐台（南四環）	租屋	是	農村	河北涿州	2012工作	北三環—豐台（南四環）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W15	女	21-30	未婚	大學	4-5.9	財務會計初級	海淀（北三環）	租屋	是	城鎮	河北—天津	2012工作—父母在北京	豐台（南四環）—海淀（北三環）牡丹園
W16	男	31-40	未婚	大學	4-5.9	財務會計	昌平（北五環外）	租屋	是	城鎮	河北保定張家口	2006工作	昌平（北五環外）
W17	男	21-30	未婚	大學	6-7.9	財務會計	朝陽（北五環外）	租屋	是	城鎮	黑龍江—遼寧	2012讀書工作	蘇州街（北三環）—朝陽北五環外
W18	男	21-30	未婚	大學	6-7.9	財務會計	老城區	租屋	不確定—其他城市	城鎮	遼寧—大連	2011工作—父母在北京	老城區四合院（父母在北京做飯館生意）
W19	男	21-30	已婚	大專	20-23.9／5	IT技術人員	海淀區紫竹院路	租屋	不確定	城市	湖北武漢	2011工作	昌平區北七家鎮（北六環）—海淀區大鐘寺附近（北三環）—海淀區紫竹院路（西三環）
W20	女	21-30	已婚	大專	16-19.9／3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昌平區七里渠（北六環）	租屋（與父母）	是	農村	江西南昌	2009實習2014工作	昌平區七里渠（北六環）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W21	女	21-30	未婚	大學	8以下／4	證券公司	朝陽區勁松（東三環）	租屋	不確定	城鎮	河北張家口	2014實習2015工作	朝　松（東三　）
W22	男	21-30	已婚	大專	12-15.9／3	IT技術人員	—	租屋	否	—	河北邯鄲	2013工作	—
W23	男	21-30	未婚	大學	12-15.9／4	IT技術人員	昌平區回龍觀（北四至北五）	租屋	否	外掛	河北石家莊	2014實習2015工作	昌平區回龍觀（北四　至北五　）
W24	男	21-30	未婚	大學	20-23.9／4	軟體技術人員	豐台東大街	租屋	否	城鎮	江西南昌	2013工作	海澱西三旗—豐台東大街
W25	女	21-30	未婚	大學	8-9.9／1	採購	海澱牡丹園	租屋	是	農村	河北定州	2012工作	一直在牡丹園附近
W26	男	21-30	未婚	大學	10-11.9／1	技術人員	海澱知春路	借住同學單位宿舍	否	農村	河北承德	2013工作	海澱萬泉莊—昌平朱辛莊—海澱知春路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W27	男	31-40	未婚	大學	20-23.9／3	技術人員	海澱韓家川村	租屋	否	農村	吉林遼源	1998工作	1998年剛來時在園林山莊 2007-2009年到昌平考試中心，三街小學；2007-2009年到輔仁大學，恭王府附近；2010-2012年知春路，住隔板間；2013年至今住在韓家川村
W28	女	21-30	未婚	大學	6-7.9／1	技術人員	海澱五棵松四環	租屋	不確定	農村	遼寧營口	2012工作	海澱五棵松，兩居一間
W29	女	21-30	已婚	大學	16-19.9／6	技術人員	昌平霍營	租屋	否	農村	陝西渭南	2012工作	海澱知春路，昌平龍澤，昌平霍營
K1	男	21-30	未婚	大學	12-15.9／5	中小企業經理人員管理者	海淀區鐵科院（北三環）	租屋	是	城鎮	廣西河池	2011上學 2015工作	昌平區沙河（北六環）—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海淀區鐵科院（北五環）
K2	女	21-30	已婚	碩士	12-15.9／2	記者	朝陽區歡樂谷（東四環）	租屋	是	外掛（中央財經大學）	河北秦皇島	2011複習考研 2015工作	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朝陽區歡樂谷（東四環）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K3	男	21-30	未婚	大學	8-11.9／3	待業	朝陽區酒仙橋（東四環）	租屋	不確定	農村	安徽安慶	2011上學2015找工作	昌平區沙河高教園（北六環）—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朝陽區酒仙橋（東四環）
K4	男	21-30	未婚	大學	8-11.9／3	總裁助理	海淀區明光橋（北三環）	租屋	是	外掛（中央財經大學）	重慶（大學期間當兵，正在申請北京戶口）	2009上學2015工作	昌平區沙河高教園（北六環）—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海淀區明光橋（北三環）
K5	男	21-30	未婚	碩士	28-31.9／3	投行企業上市	西城區阜成門（西二環）	租屋	很大可能	外掛（中央財經大學）	貴州貴陽（正在申請北京戶口）		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西城區阜成門（西二環）
K6	男	21-30	未婚	大學	8-11.9／1 16-19.9／3	會計事務所審計	東城區崇文門（東二環）	租屋	不太可能	外掛（中央財經大學）	廣西南寧	2010上學2014工作	昌平區沙河高教園（北六環）—海淀區學院南路（北三環）—東城區崇文門（東二環）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K7	男	21-30	未婚	大學	20-23.9／3	銀行客戶經理	海澱交大東路	租屋	不確定	農村	湖北隨州	2011上學工作	中央財經大學沙河校區（北六環）—中央財經大學學院南路校區（北三環）—海澱西直門
K8	女	21-30	未婚	大學	8-11.9／4	人力資源專員	朝陽立水橋南	租屋	最近兩三年會	城鎮	黑龍江雙鴨山	2010上學工作	中央財經大學沙河校區—中央財經大學學院南路校區—清河—草房—朝陽立水橋
K9	男	21-30	未婚	大學	16萬及以上	技術人員	海澱健德門	租屋	是	農村	山東濟南	2013工作	一直在海澱健德門，最近因為房價上漲，考慮到西二旗住
R1	男	31-40	未婚	初中	10-11.9／2	大學咖啡鋪	北外魏公村	租房	不確定	農村	河北邯鄲	1998工作	馬甸（北三環）—方庄（南三環）—空泰（東三環)—蘇州橋—北四環—沅橋—魏公村
R2	女	41-50	已婚	小學	12萬-15萬九千／4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海澱明光村北三環	租屋	否	城鎮	河南南陽	2000工作	海淀區四道口（北三環）—海淀區清河（北三環）—海淀區北太平莊明光村小區（北三環）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R3	女	41-50	已婚	高中	8萬以下／3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海澱明光村北三環	租屋	否	城鎮	湖北武漢	2002工作	海淀區文慧橋（北二環至北三環）—海淀區金五星批發市場后（北三環）
R4	男	41-50	已婚	小學	8-11.9／3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朝陽區雙橋（東五環）	租屋	否	農村	河北衡水	1996工作	盧溝橋（丰台區南五環）—朝陽區簋街（東二環）—密雲區、大興區—朝陽區雙橋（東五環）
R5	男	41-50	已婚	初中	16-19.9／4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海地區知春路（北三環至北四環）	租屋	否	農村	安徽安慶	1998工作	海地區知春路（北三環至北四環）—海淀區馬甸橋（北三環）—海淀區金五星（北三環）—海地區知春路（北三環至北四環）
R6	男	41-50	已婚	初中	8萬以下／2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海澱明光村北三環	租屋	否	農村	安徽合肥	1988（首次）2003再來工作	2003年之後大紅門—木樨園—北京交通大學—金五星批發市場

受訪者代號	性別	年齡	婚姻	教育程度	個人（家庭）年收入／人數	職業	現居地地點	現在住房	未來是否打算長期定居北京	戶口類型	來自省市	來北京時間與目的	遷移地點
R7	女	41-50	已婚	初中	8萬以下／4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海澱明光村北三環	租屋	否	農村	湖南韶山	1997工作	岳各莊—沙窩—金五星批發市場
R8	男	41-50	已婚	初中	8-11.9／3	個體工商戶小業主	海澱明光村北三環	租屋	否	農村	安徽宿州	2005工作	大興西紅門—大鐘寺—金五星批發市場

註：P代表「邊緣專業」群體；W代表「邊緣白領」群體；K代表「邊緣知識」群體；R代表「邊緣富裕」群體。「英商」指的是英國的律師事務所，因為屬於「外資企業」，因此與本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待遇以及取得戶口的配額不盡相同。「國企」為「國有企業」，「私企」為「私有企業」，「小業主」為從事小型商品販售或小型餐飲的企業主。

airiti

The Spatial and Social Mobility of New Migrants to Beijing: Staying or Leaving?

Yu-Ling Song* Kam Wing Ch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new migrants to Beijing have achieve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o become the middle class through spatial mobility. Expanding the size of the middle class is one of China's development goals. With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till exerting a strong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there exist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nd social mobility among new migrants. This research asks two questions: What a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ocial mobility of new migrants to Beijing? Can spatial mobility overcom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on the path to social mobility?

Our research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rouping of new migrants through fieldwork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57 respondents. Based on their social class status, we divide the new migrants into four groups: "marginal professionals," "marginal white-collar," "new college graduates," and "marginal new r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spatial mo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groups of new migrant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overlapping their major feature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among the four groups, the "marginal professionals" and "marginal new rich",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uling@cc.ncue.edu.tw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E-mail: kwchan@uw.edu

Received: October 3, 2017；accepted: December 26, 2017.

airiti

who possess the most and the least cultural capital, respectively,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accumulate capital through spatial mobility and continue their movement in the future. The "new college graduates" also have plentiful cultural capital, but their experience in spatial mobility is all education-related. These moves cannot be turned into the capital to increase social mobility. For new migrants to Beijing, cultural capital cannot become the key driver of social mobility. The unique phenomenon of Beijing's marginal middle class also shows in their view of the hukou system. Because of the exclusion by the hukou system, groups having more negative views of the hukou system tend to search for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spatial mo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groups which are indifferent to the hukou system or succumb to the pressure of the hukou system are are less likely to accumulate capital through spatial mobility. Though they are candidates for the new middle class, their living space in the city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duced under 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They face a difficult decision as to whether to stay, or leave Beijing.

Keywords: spatial mobility, social mobility, marginal middle class, new migrants, Beijing